

# 新住民家庭跨文化適應歷程之個案研究 ——現象學觀點

## A Case Study of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for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by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張智嵐<sup>1</sup>、徐西森<sup>2</sup>  
Chih-Lan Chang<sup>1</sup>, Xi-Sen Xu<sup>2</sup>

### 摘 要

本研究期待看見新住民家庭適應歷程中的阻力與助力，以協助其在本土社會文化中的調適與融入，故其文化適應歷程是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的現象學分析，半結構化之形式進行訪談，透過立意取向，由學校、社區等相關機構推薦、篩選後，選擇一對結婚十年以上並育有學齡子女的新住民家庭夫妻作為參與者。研究結果如下：一、原生文化影響婚姻決定：原生文化對於臺灣、對跨國婚姻之評價，以及對於另一半的考量要件，加上周遭他人結婚來臺之經驗，成為遠嫁之推力。二、原生文化影響婚後家內適應：陸籍妻子因臺灣和原文化裡的風俗民情差異不大，故環境適應容易，此外其文化和臺灣在於性別分工上的想法相近，這點可能和兩地地緣、文化風氣接近有關。三、人際圈之建立有助於新住民妻子之調適：新住民妻子剛來臺時生活支柱為配偶，若先生能提供新住民配偶在穩定關係中感受到滋養、安全，將有助於減低其親職壓力。四、感知的偏見與自我認同感：外界對於新住民家庭仍有偏見或以偏概全之想法，也影響了社會對她們的信任感及延伸的就業機會。此外新住民妻子更看重自己是否能以「母職」角色獲得先生、孩子甚至是外界的認同，也連帶影響到其對婚姻的滿意度。

**關鍵詞：**新住民家庭、跨文化適應、現象學

<sup>1</sup>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博士生

<sup>2</sup>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專任教授

通訊作者：張智嵐，（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E-mail：antipode1224@yahoo.com.tw



## 壹、前言

全球化發展和流動不僅在經濟領域增加了跨境交易，跨國婚姻趨勢更在全球移民潮中居主導地位（Friedman, 2012）。現今臺灣已然進入新移民社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動和政府的南向政策等，間接促成了國際婚姻（夏曉鵬，2006；陳芬苓，2014）。另外亦有臺灣社會的底層男士因結婚困難而委由仲介公司招親，而這些婚姻移民的歸化也使得臺灣——中華民國成為了多元族群的國家（戴台馨，2012）。當社會多元文化的涵養越高，則越能友善對外來文化及外來者，但臺灣目前對於多元文化的建構及面對社會變遷的狀態，似乎仍在調整、適應之中。

### 一、新住民家庭的適應難題

正因跨國婚姻是全亞洲自二十世紀之後大量開展的現象，其中不乏因經濟因素而發展的婚姻關係，此時社會文化中的權力不平等議題及多元文化家庭關係浮現，但此現象造成的社會及性別角色問題仍未妥善解決（Lee, 2012）。雖然跨國婚姻下女性新移民的經濟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通常必須適應移入國父權文化的衝擊，且容易因文化差異而衍生出生活適應問題（Belanger & Linh, 2011）。

對於新住民的歧視可能不只來自於社會群體而是由國家政策開始，Friedman（2012）整理移民和家庭重聚的研究後認為移民法和其政策為表面上致力於平等、包容，實質上仍舊隱含了排斥和不平等。Yeoh、Leng 與 Dung（2013）也認為當國家政策要求新住民家庭出生的孩

子在出生時自動沿襲父親的種族，這樣的做法忽視了跨國婚姻而生的獨特種族與文化，也影響其在本土社會的融入。唐文慧與王宏仁（2011）在研究中也發現新住民家庭對各自性別角色的期待有所落差，臺灣夫家會期待新住民女性扮演以夫家為重的傳統女性，但願意跨國結婚移民來臺的女性常會抱持著提升個人經濟能力、金援原生家庭的期待，當雙方想像與現實有所落差時，如何協調與相互配合便成新住民家庭的重要課題。

### 二、新住民夫妻關係與文化影響

相較於一般家庭對於夫妻衝突的處理，新住民女性因擔憂親密關係（婚姻的破裂）會影響其居住權，過去法令對他們的限制與定位也讓他們在婚姻中必須更加謹慎、小心（Friedman, 2012）。研究中發現新住民婦女在尚未取得戶籍之前很難感受到足夠的安全感，特別是陸籍配偶（Sandel, 2011）。正如Yeoh、Leng 與 Dung（2013）提到臺灣和亞洲許多發達國家一樣，來自待發展國家的移民婦女（如東南亞新娘）與本國公民結婚後，常無法成為潛在的勞動力，而是依賴於本國籍丈夫的家庭之中，也使得他們失去居住、工作和教養兒童權利的談判權，困擾於缺乏語言溝通、社會支持網絡、經濟依賴和恐懼被驅逐出境等。

臺灣的家庭型態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男性優勢傾向略顯衰退趨向，但多仍依循性別角色規範行事，在傳統與現代思維過渡和轉換時期，對家庭內的家事分工、教養子女、家庭決策、出外就業等問題上，很容易出現適應困難和婚姻衝突的潛在因素，而男性中心和角



色優先的家庭文化特徵，對女性自主性和自我發展更有著顯著影響（高旭繁、陸洛，2006）。過去跨國婚姻的研究中常偏重於對婦女的加暴行為，有關亞洲跨國婚姻的文獻中多試圖揭示社會文化權力關係的不平衡以及多文化家庭關係（Palriwala & Uberoi, 2008）。國內陳芬苓、黃翠紋、嚴祥鸞（2011）統計國內家庭暴力通報比例，發現外籍婦女（以東南亞籍為主）、大陸籍婦女遭受婚姻暴力所占總案件比例逐年提高，且新移民可能受限於因語言隔閡、不諳法令、擔心報案影響居留申請、被驅逐出境、影響與子女相處權利等因素而不願通報，因此新移民婦女受暴發生率很可能是被低估的。

但當媒體傳播或是文獻研究傾向「過度問題化」新住民女性在臺生活的經驗，著重在來臺後所可能造成的問題，甚至推論其子女學習發展遲緩等，這些研究結果多呈現生活困境和教養難題，可能反而化約了新住民女性在生活中所能展現的能動性，除僅突顯出其弱勢情境，進而在理解他們的生命圖像時也容易帶有偏頗、難窺全貌（王翊涵，2011；唐文慧、王宏仁，2011；陳芬苓，2014），所以如何同時看見新住民家庭適應之阻力與助力也成為本研究之期待。瞭解目前新住民家庭在我國文化社會情境中的處境及所需協助，有助於新住民家庭在本地社會文化中的調適與融入，故新住民家庭本身的文化適應歷程即為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

## 貳、研究方法

### 一、研究設計

學者對新住民家庭面臨不同文化的

調和適應歷程相當關注，亦嘗試以家庭壓力與適應模式來理解每個人經驗原生文化內部和不同文化之間共同點和差異點的獨特性，其模式的重點是將「家庭適應」作為「家庭壓力」與「家庭應對資源」相互作用的函數，認為此模式適用於涉及家庭的所有文化（Hamido & Robert, 2012）。故本研究整理新住民適應歷程相關研究之看見，以個體適應、對壓力的覺知及因應資源作為研究訪談之主要架構。

本研究對於新住民家庭中的夫妻雙方如何經驗、理解其生活適應歷程，在方法學上難以客觀量化之形式進行操作，故採質性研究中的現象學作為覺知當事人主觀經驗之研究典範，透過現象還原、想像變異，與現象意義和本質的整合三個步驟，探究個人生命經驗或生活世界及其背後的意義與本質（鈕文英，2017）。希望客觀、詳實地描述受訪者內心的主觀經驗與感受詮釋，讓讀者感受新住民家庭受訪者的獨特故事，並看見受訪者因跨國婚配而經歷的婚姻歷程脈絡。本研究所蒐集的描述性資料依據Hycner（1985）所提出的「現象學內容分析」作為分析之指導原則，並參考鈕文英（2017）詳列步驟之指示，分析訪談稿。首先閱讀逐字稿、修改錯別字並有概括性的瞭解，之後逐句區辨意義性資料並描述，將所有概念命名條列，相類似意義之概念予以編號，再群聚以形成類別並給予類別名稱，整理出受訪者獨特的主題世界。之後重新整理資料中所發掘到的主題，找出其共通及相異性，回應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

###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為立意取向之個案研究，因



探討議題須透過大量的陳述以呈現當事人在其適應歷程的經驗與內在感受，故選擇結婚二十年以上並育有學齡子女的新住民家庭夫妻作為參與者，且透過學校、社區等相關機構推薦、篩選而來。而個案研究之特點在於能將焦點置於特定事實或情況來研究現象，在自然環境中研究現象及個案參與者之內觀觀點，揭示某期間之發展現象且重點在研究對象所具之代表性而非唯一性因素（鈕文英，2017）。故此次受訪家庭如同一般大眾對新住民家庭傳統角色分工的想像：相識時間短（半年，第二次碰面即婚禮）、男主外女主內、年齡差異懸殊、新住民妻子因國籍感受到求職上的弱勢，此外該受訪家庭除對子女教育關注之外，雙方皆無上一代介入小家庭活動之情形，得以看見不同文化的個體在無長輩影響之狀態下，如何組建家庭、邁向適應，詳見表1。

###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訪談大綱為重要之資料收集工具，而大綱之擬定由研究目標發想，根據文獻探討之整理以設計訪題，並經專家學者及具與新住民家庭工作實務經驗者之建議訂立訪談綱要，採半結構化之形式進行訪談，以讓研究參與者有更多分享空間。研究者與資料偕同分析者在取得心理師執照後，便投入於社區、學校心理諮商實務，有多次協助學校輔

導室辦理內政部新住民家庭之火炬計畫之經驗，對於新住民家庭有較多的接觸與涉入，在理解本研究主題、資料收集及解讀上提供更貼近及深化的分析基礎。

### 四、訪談過程之反思與限制

研究訪談地點應受訪者意願而擇定於受訪者家中進行，其優點在於：受訪者處在熟悉情境中能夠較為自然、放鬆，而開放讓研究者進入家裡亦帶有接納研究者進一步接觸案家、深入梳理家庭適應脈絡的意味在；缺點則是易受外來干擾，如電話、鄰居、甚至垃圾車等，都可能暫時中斷訪談過程，此外當受訪夫妻皆在家中時，除了干擾因素較多之外，對於訪談分享內容可能會有更多顧慮或表達較為委婉保守，亦會出現配偶在旁補充說明之情景。這種現象雖然可能會影響當下受訪者之主觀表達，但另一面向看來也是在呈現夫妻雙方之互動型態，提供給研究者更多訊息線索，且配偶之補充有時對當下受訪者來說亦得到正向回饋（行為被關注、看重）。

此外訪談大綱範圍較廣，須對受訪者有較多引導，雖使談話主題明確，但也可能會限縮其分享的廣度，訪談過程中也因研究者工作特質之影響有較多回應與引導，建議訪談大綱可調整為更開放、具發散性，以讓參與者可以有較多

表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原籍	年齡	婚齡	職業	子女數
夫 (J)	臺灣	58	22	油漆師傅	2
妻 (W)	中國大陸	45	22	家管	2

註：育有兩女，長女 21 歲、么女 14 歲



空間發揮並呈現個人主觀覺知屬於重要性之議題。

## 五、研究品質的檢核與研究倫理

Lincoln在1995年提出了研究嚴謹度或值得信任度的檢核方法，認為現象學研究法為建構主義之一環，以下就其提出的研究真實性之標準：公平性與真實性的概念來探討本研究之研究品質。

### （一）公平性

為求公平性，檢核訪談所得之資料是否能夠真實反映出受訪者之原意，未有修改或擅自援引之現象，亦在分析完訪談逐字稿之後，請受訪者再度進行確認。在訪談品質方面，讓受訪者有自由發揮的空間，研究者的引導僅於初步的探問，以免有過度引導或暗示受訪者之嫌。

### （二）真實性

資料分析時儘可能由逐字稿中還原出受訪者的世界，以呈現出清晰的家庭互動狀況及適應歷程，且本研究邀請一名諮商所博士班人員作為偕同分析者，避免研究者的個人偏見或侷限，也將研究結果回饋給各受訪者，以確保研究者所見與受訪者所述並無相違之處，符合其內在知覺。

### （三）研究倫理

考量受訪者的權益及符合研究倫理，訪談前會先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的性質與目的，提供必要的資訊，及參與者在任何階段均有退出研究的權利，在研究的所有階段確實做到對受訪者的匿名，取得受訪者同意書。此外在訪談前除與參與者建立良好關係，留意訪談場域之穩定感及受訪者情緒狀態外，訪談結束後給予正向回饋並提供後續諮商或

諮詢資源之管道供受訪者參考。

## 參、研究結果：JW新住民家庭跨文化適應歷程

本研究依JW夫妻在跨文化適應歷程中的階段順序，進行說明與討論：

### 一、原生文化對成家概念的影響

#### （一）對婚姻的嚮往

W回想自己嫁來臺灣的過程以「傻人有傻福」來形容，因當時原生家庭之因素，『我爸爸媽媽他們從小時常在吵架……所以家庭的環境、氣氛各個方面，我就不喜歡。所以我想說，有比較遠的地方趕快跑遠一點（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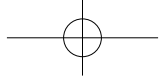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W01-11）。W也直言不喜歡原居住地上海的氛圍，『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心裡面就有一種念頭，我要是嫁人我不喜歡嫁給上海人。』（W01-10），此時W起了遠走他鄉的念頭，加上身邊友人亦有遠嫁他國的想法，又聽聞他人來臺後的生活狀況，使W對於結婚來臺較為放心。

#### （二）年齡到了，就該結婚了

J、W在其原生文化裡，在到了他人口中的適婚年齡之後，便開始有人積極媒合、物色結婚對象，而J和W便是在朋友介紹下，通信半年後便結婚。『那個時候年紀也蠻大了啊……』（J01-04）、『而且我當初那個年紀，妳說，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了。』（W01-7），兩人自覺受年齡驅使自己選擇婚姻的成分頗大，故書信往返、確認彼此均有結婚共識後，兩人第二次碰面已是在婚禮上了。

#### （三）生活歷練、成家決心

J認為父母早逝，所以對自己的婚姻



有絕對的自主權，也因而更有責任感，加上J因工作關係習慣調整脾氣，成家後也對自己有所期待，所以會學習忍讓，『在外面（工作）這麼久了，脾氣就已經控制很好了。要結婚的話你就是自己一定要約束自己啊，你不約束自己，你要結這個婚的話，應該是很難。』（J01-65:70），不把外面的情緒帶回家及情緒管理是J經過生活歷練之後的收穫。

W則是因從小成長於廣闊的新疆，後來舉家搬遷到大都市上海居住，所以對自己的適應能力有自信，加上幼時因父親身體因素到外地醫療，也習慣了照顧自己和適應環境。『那個時候我們爸爸媽媽都不在啊，阿就是男生（哥哥）寄住在誰家，女生（W）寄住在誰家這樣。所以說這個說適應環境這一點對我來說，是沒問題的。』（W01-09）。W來臺後也的確很快地便融入了環境，更增長個人自信。

## 二、文化對適應的影響

### （一）宗教差異

臺灣和上海之間的文化差異體現在生活中時，W感受較多的部分在於宗教。『剛來的時候我就發現，這邊的人遇到什麼事情，比較不知道說該怎麼去處理，就會以他的宗教的那種善的口吻，就會說「啊你可以怎麼樣可以怎麼樣」。』（W01-33）。W感覺臺灣人會由宗教角度去解讀生活中的難題並提出建議，而成長於新疆的W幾乎未曾接觸過任何宗教，所以剛到臺灣時，曾被佛堂裡的紅燈擺設嚇到，但生活中非得接觸宗教，使W開始習慣臺灣的宗教文化，到後來也因認同祭祀對象是「自己家的」而減少了恐懼感。仔細思索後W也提到兩地習俗間還是有相似的地方，

『比方說像那個端午節吃粽子什麼之類，清明節，有的時候會有那個草阿粿？但是上海他不是用草做的那個草阿粿，但是他是青糰，也是綠色的，有點像。』（W01-40），習俗文化的相近讓W感覺在適應上更為順利。

### （二）性別文化

先生對於身為男性，有負起外出工作賺錢的認知，也認為妻子在家打理家事，符合賢妻良母的形象。『那男人嘛，就我們就工作，盡量賺錢。那老婆在家她就是，結婚了就是看小孩子帶小孩子，所以他很多年沒去工作，當個賢妻良母（笑）。』（J01-9:10）。W也覺得夫妻之間應相互體諒、工作分配，『其實大部分的階段我都沒在上班，所以說我先生他的工作又比較辛苦，所以說往往他工作回來也都很累了。所以我盡可能的家裡面的事情，那我能處理的都是我處理。』（W01-78）。雖然家內分工似是依循男主外、女主內的原則，但W也相當感謝先生的體諒，常會主動協助，所以先生並未讓W感覺到特別大男人主義的現象，而是共同合作的狀態居多。

W認為自己反倒在分工上有一些性別印象，對於男、女生各自應負責的工作有既定想法。『比方說，燈泡壞了，即便我會換我也不去換，這種事情即便我會做我也不去做。因為我覺得說那樣我來我還嫁老公做什麼？（笑）有的事情，我覺得該男人承擔的事情啊，還是要叫他去處理一下。』（W01-82）。而W也認為先生身為一家之主，重要大事應交由先生決定，這樣的責任劃分對妻子來說較不歸類為性別影響，而是自己本身性格所致，加上不是家中經濟收入來源之一，也是W對自己不夠有信心的因素。『因為我覺得說他是一家之主



嘛，然後真的要擔當還是要他去。阿我也沒有上班賺錢，然後我還是靠他養，所以說我覺得說我沒這個本事來擔當，還是由他決定就好了。」（W01-124:125）。

### （三）子女教育

除了家事之外，JW在教育上也採協同合作的方式，但J認為自己個性、要求都和妻子不同，故難有良好的配合。造成夫妻雙方對於教養嚴謹度不一的因素之一也包含了傳統性別期待，J覺得過去觀念裡對女性在教育上其實未有太多要求，『以前我們這一輩有一些觀念吧，想說女生，反正讀書她讀，就盡量讀嘛。然後能配合她的就配合她。然後也沒有要求說特別高。』（J01-21）。當J和妻子在教養上不同調時，J較常以沉默來迴避衝突。對於先生讓小孩自由成長、享受快樂童年的想法有時會造成夫妻間標準不一，所以對W來說較辛苦的部分是和先生在管教上配合不佳，W自認已與先生溝通過很多次，『我也不知道他是沒聽懂，還是說他不聽（笑），反正這個事情總是始終做得我沒有很滿意過。我也不是很會表達，我也不知道我講的意思他有沒有聽懂。（笑）』（W01-95）

教育想法上的差異可能來自於原生環境，JW都認為需要較長期的磨合與理解，兩人都提到對彼此原生教育文化的觀察，如W提到『臺灣我發現很多的家長就是說，「讀書他會讀就讀，不會讀就隨便他了」，然後只要不要學壞就好了。那我們從小在大陸就是說，特別是在大陸你看人又多、競爭的很，好像對課業都要求的蠻那個的。』（W01-67）。J對於大陸教育文化也略有耳聞，『大陸那邊他們的要求比較高。他們那邊要一直要求小孩子要拼命的讀。我說

那個讀書也是要看資質啊，而且我們南部跟北部，他們讀書的要求又不是一樣。』（J01-53）

## 三、環境資源

### （一）鄰居接納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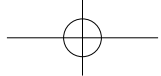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W對鄰居的熱情印象深刻，透過鄰居的主動親近及介紹，W得以迅速的接觸到當地生活型態並學習運用社區資源。W也自認會適時調整個人態度以適應不同的人際情境，『其實我個性，說真的有的地方蠻內向的，但是我知道說我要主動的時候我就會主動。』（W01-50），W能隨著情境不同而轉換人際模式，加上臺灣人生性熱情也有助於W融入社區。

### （二）政策轉變，趨向友善

國家政策方面，W覺得一開始臺灣對於陸籍人士較不友善，但隨著兩岸接觸變得頻繁，W也感覺到情勢有些不同了，『像很多的課程是針對外籍配偶或什麼價錢上，都比較優待之類的。教她們一些簡單的課程，或者是讓她們分享一下當地娘家的，算是回味娘家那邊的一些東西。』（W01-134:135），W感受到政策的轉變似乎也在表示對新住民有更多的接納意願。

### （三）身分認同感

W認為自己在情感和實質想法認同上早已更傾向臺灣，這樣的轉變和自己的生命成長歷程有關，『很多的事情我都是比較認同這邊。我小時候在上海在新疆，是成長階段，是不成熟的。我的成熟階段在這邊。來到這邊以後，慢慢的經歷一些事情，自己要獨立去面對很多事情。』（W01-149-151）。擁有自己的家庭，學習承擔責任、成為父母，對W來說都是自己邁向成熟的過程，所以W



自覺自己是較歸屬為臺灣的。後來因父親過世，再回上海家裡時疏離的感受也更強了，『現在不是回家的感覺，妳知道嗎？因為我當初出來的時候，我哥哥還沒有結婚。後來結婚了以後，因為我大嫂還有他的小孩，對我來說都是很陌生的，但這兩個人又是他最親近的人，所以說，現在回去，是一種作客的感覺，不是回家的感覺。』（W01-12）。W感覺自己似乎不再是原生家庭裡的主成員，回去探望的念頭也少了。

#### （四）小家庭的正向目標

目前J、W兩人皆以協助小孩成長、順利進入社會是兩人重要的階段性任務，而且穩定家庭、認真經營的關鍵因素也是考量到小孩，須待任務達成之後方能考量到自己的生活，『我們現在就是努力幫她們，把她們養大嘛帶大嘛。等她們以後就是真的學校出來或者工作什麼的，阿就她們自己去發展，所以現在就是一心全力把她們先培養出來。』（W01-136）。J和W都提到培養小孩到高中之後就能放鬆的過自己的退休生活，在那之前的生活重心都還在小孩身上。

#### （五）夫妻關係影響婚姻滿意度

先生的好脾氣除了符合W一開始對於結婚對象的要求之外，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也讓W更感覺到性格之於婚姻的重要性，『他一開始想法就是阿老婆娶回來是疼的，不是說要求妳做什麼做什麼。』（W01-116），所以W認為維繫婚姻和諧最大的因素來自於先生，『因為妳想說我們過來什麼人都不認識，阿唯一投靠的就是他。阿他若是好的話我們才待得下去，他若是不好的話我一天都待不下去，我們就是互相經營這樣。』（W01-103:131），W來臺後也的確感受到先生有努力在實行其承諾，故加深了

W陪伴彼此、經營婚姻的信心與決心。

而J也認為丈夫的表現影響家庭最巨，『外籍嫁過來，為什麼又會回去？或者是為什麼會離婚？任何的事情都是取決在於先生。不是先生酗酒、打老婆，就是嗜賭如命的，然後不務正業的，家庭才會分裂。』（J01-117:119），也因先生認為老公需承擔婚姻和諧的責任並自我期許，令W也有很高的意願共同經營、維繫婚姻美滿，『要是怎樣的話，造成到很大的損失或者是……那我還是陪他一起過，就是說好日子也是過，不好的日子也是這樣過。』（W01-128）。

W也自覺受先生影響而改變了在原生家庭養成的性格，『其實我過來這邊受我先生的影響，真的我脾氣改很多。我們從小在家裡甚至生活環境之下，因為我爸爸脾氣也很爆，所以脾氣也不好。』（W01-66）。W原本性格較急、行事爽快，一開始不習慣先生做事慢悠，後來W感覺到這樣的性格對於生活帶來的正向影響，便也慢慢認同其態度。

## 四、適應阻力：標籤化、偏見

### （一）講價碼的婚姻

W來臺後透過媒體及大眾傳播，發現跨國婚姻中「講價碼」的婚姻形式讓國人對她們有更多成見，『嫁過來的有很多種嘛。有的是自由、自己認識過來的，有的是甚至通過仲介過來的，還有的真的是講條件過來的。像我有個朋友她娘家那邊是講價碼的（笑）。』（W01-55）。當婚姻牽涉到錢的時候，自然會引來別人不好的觀感，『那坦白說很多大陸嫁過來的，很多就是為了錢嫁過來，然後有些不擇手段做了一些不



好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事實。老鼠害一鍋湯就是這種（笑）。還有很多那種騙婚的，就是假結婚過來真賣淫的做那種。這些也都是事實啊，所以人家對你瞧不起你，也是應該的啊，對不對。」（W01-59）。而這些造成他人負面印象的事實及標籤，都是W到臺灣後才發覺、感受到的，『就是聽婆婆媽媽有的時候說，「啊～那個誰誰誰，來了以後，阿，一直說拿多少錢回去」怎麼怎麼的，一直把錢或帶東西回去之類的，多少有聽到啦。」（W01-61）。他人對於外籍新娘的負面傳聞令W有些無奈但也只能接受現實、自我調適。

W來臺後常會聽到別人在談論外籍新娘，『有的時候會說，誰家的媳婦怎麼樣、都會煮飯或者是說對公婆好不好之類的，我多少都會有聽到一些。應該是對外籍都會比較那個……』（W01-53:54）。當這樣的比較令W感受到較針對外籍新娘且注重媳婦在家內的表現時，無形中也給W帶來不少壓力。

## （二）弱勢標籤及自我認同

先生從旁觀察，也認為社會早已先將新住民妻子貼上標籤，『外籍新娘在臺灣還是外籍新娘，她是大陸就還是大陸，身份證拿出來就有了。然後還有人在外面想要工作什麼的，都會被釘上一個標籤啊』（J01-125:128），而對於和外籍女子結婚的男性W也認為社會早有成見，『其實就跟我們在大陸一樣，有一個確定的就是那麼大老遠的娶個老婆回來，在當地不管是說工作沒有那麼好，或者是說收入沒那麼高，或者是自身條件有所障礙之類的，一定是比較弱才會大老遠的去娶個老婆回來，不然娶當地的就好了，為什麼要那麼遠的去娶個老婆回來？』（W01-56）。W不避諱談論這些所謂的事實，也認同女子嫁人

後應順應對方家庭，『就是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然後好了妳就待，不好了妳就走了（笑），這種對臺灣當地人或者家庭來說也是一種傷害。』（W01-60）

J則認為自己不需要理會他人的想法，而且家庭生活是自己在過，不需要他人過多的意見，秉持自己家庭和樂的信念就好。『我自己的中心思想就是說，把老婆娶回來、家庭和樂，這樣就好了。家庭什麼是我的事情。日子我自己在過我也覺得很好，那我還要要求什麼？我管你們說什麼咧，根本不會影響到我。』（J01-108:111）

## （三）工作阻力

生活中較讓W感到阻礙的是在求職經驗上，除了一開始來臺時無法工作之外，也很難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性質，而且W和J均有以家庭為重、優先照顧小孩的觀念，使W在工作選擇上更少。W本身的學歷、語言、年紀或主管不直接言明的顧慮等因素，都成了W找工作時的阻力。『像學歷上我們也沒有很高，而且就是像台語不通，我們去應徵，那些老闆也好或者應試主管也好，他們會怕、擔心文化不同，或是說怕我們沒辦法適應，還是會顧慮這點。』（W01-64）。所以找工作對W來說，就像是運氣和實力的雙重考驗。

## （四）小結

JW夫妻均提到因原生文化之影響而使自己考量成家年紀，故較積極的尋求婚配並迅速決定結婚一事，且因生活歷練及語言相近等因素，兩人皆對自身婚後適應能力有一定自信。當W進入J的原生文化後，兩人均能感受到受文化所影響之環境資源與壓力，即臺灣社會所給予的正向接納、友善政策，以及標籤化、就業困難等負向壓力。環境資源、壓力及原生文化又對小家庭內的文化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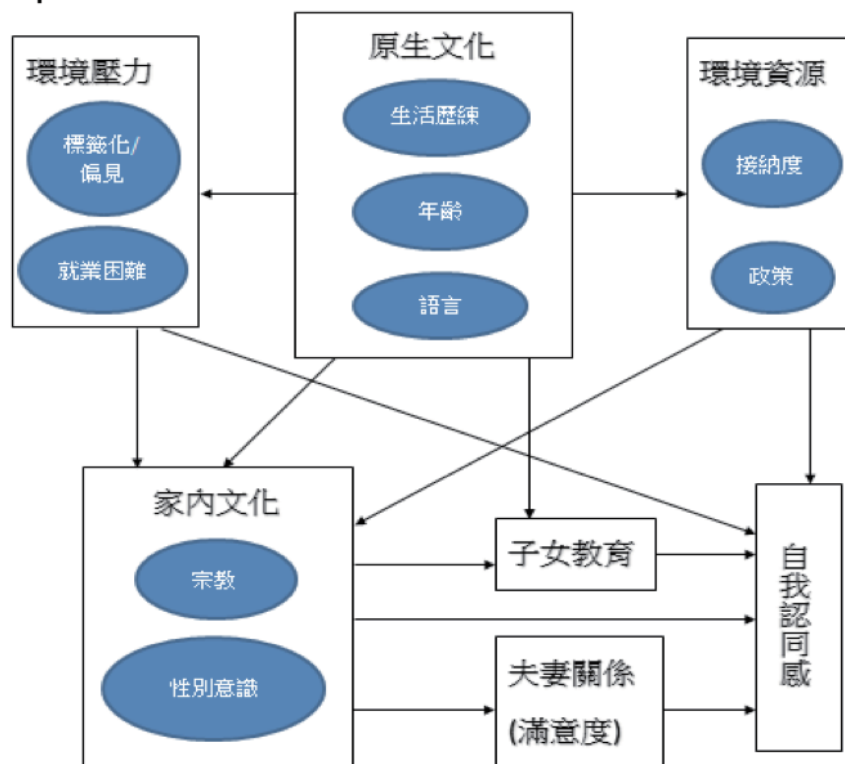


圖1 JW夫妻跨文化適應結構模型圖

來影響，較明顯的部分在於宗教及性別意識，而這些因素也連帶地影響其子女教育、夫妻關係及其自我認同感。在跨國婚姻當中，個人之自我認同感會受到子女教育合作是否順暢、夫妻間關係、家內文化對性別的意識（性別角色印象）以及環境給予的壓力或資源等，而影響其自我評價與認同，詳見圖1。

## 肆、討論

### 一、原生文化影響婚姻決定

研究中可以看見原生文化對於個人婚嫁一事的影響，如新住民配偶分享自己結婚來臺之緣由時，多半會提到其原生地對於臺灣、對於跨國婚姻之評價，以及對於另一半的考量要件，另外周遭他人亦會分享較多結婚來臺之經驗，成

為她們遠嫁來臺之推力。

### 二、原生文化影響婚後家內適應

研究中陸籍妻子W對於環境適應表示容易，因為和原生文化裡的風俗民情差異不大，也可以看見其文化和臺灣在於性別分工上的想法其實相近，皆認為「男主外、女主內」，先生亦有相同想法，這點可能和兩地地緣、文化風氣接近有關，正如同Sandel（2011）認為男性受經濟結構、性別比例失衡、性別刻板分工觀念等所影響，會傾向找認同傳統性別分工的女性結婚。

此外先生也會認為妻子主責子女教育較合適，因其語言溝通或是行為常規的要求、處罰等均較男性來得適宜，但妻子相較之下較無性別教養觀念，反倒認為不同性別之天生氣質及教養方式，



應能有更好的配合與相互搭配，而 McKenry 和 Price (2005) 的觀點則和妻子相近。認為夫妻共同合作親職工作可提升家庭凝聚力，對兒童早期成長具關鍵角色。

### 三、人際圈之建立有助於新住民妻子之調適

妻子W提及自己剛來臺時無親友可以諮詢、依靠，所以生活支柱全在配偶身上，若此時先生無法給予較多支持與鼓勵，妻子當下會有較多負面情緒並引發夫妻衝突。而當能提供新住民配偶在穩定關係中感受到滋養、安全時，將有助於減低其親職壓力，因學者們多主張增加夫妻個人實質或心理資源時，能增進其自我效能感並減低其親職壓力 (Feinberg, 2003)。

### 四、感知的偏見與自我認同感

JW夫妻皆感覺到外界對於新住民家庭仍有異樣眼光，其中多半是偏見或以偏概全之想法，Sheu (2007) 也指出新住民女性面臨許多適應上的問題，特別是歧視與標籤化，對新住民女性的生活適應與自我價值感來說是嚴重的危機，連帶的也影響了社會對她們的信任感及延伸的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W認為子女表現可反映個人親職工作之能力，而另一半對婚姻滿意度的回饋中也會提到對妻子育兒成效的認同。原本夫妻兩人從彼此的配偶身分轉變為父母，通常研究結果顯示這樣身分轉換將會影響婚姻關係的滿意度 (Doss, Rhoades, Stanley, & Markman, 2009)，這也印證研究中所呈現，妻子不僅在意自己配偶身分，更看重自己是

否能以「母職」角色獲得先生、孩子甚至是外界的認同，而配偶雙方在親職角色扮演成功與否，也連帶影響到其對婚姻的滿意度。

## 伍、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 (一) 原生文化之推力

JW兩人在結婚前受原文化之影響，如對適婚年齡的看重，使兩人皆有向外尋求配偶之準備，特別W因對其原生文化的疏離感而增加了對臺灣的喜好與歸屬感，加上兩人本身亦具適應性人格特質，彼此文化相近，有助於適應順利。

#### (二) 原生文化對家內文化之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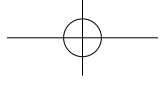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原生文化影響在小家庭內顯現較多的在於宗教及性別意識，連帶地也影響其子女教育及夫妻角色分工、互動關係等，雖然共親職型態受性別印象影響是隱微的，兩人未明確意識到行為模式受傳統性別觀念影響，但訪談可見家內分工、子女期待有性別分野。

#### (三) 環境給予的助力及阻力

當社區或是政策釋出足夠善意時，能加快新住民配偶的適應感，但若環境給予的標籤或偏見較重時，常讓新住民配偶退縮回家庭內，使其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更強化，語言溝通亦是影響新住民配偶融入社會、就業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自身經濟產值或是對小家庭生活上的挹注也是新住民配偶自我認同及價值感的關鍵。

#### (四) 自我認同感有助於適應

J對於家庭目標之堅持、W對臺灣之歸屬感，以及透過子女教育、夫妻關係之正回饋，增長彼此之自我認同感及效



能感，也對其他層面之適應提供了正向循環。

## 二、建議

### (一) 鼓勵新住民夫妻婚後持續諮詢並參與親職教育

新住民配偶帶著其原生文化之教育觀來養育下一代時，常會遇到和配偶、長輩等意見相左的時候，此時若能提供其對於親職教育之諮詢，引導雙方理解彼此原生文化教育觀之差異，將有助於夫妻雙方對親職工作較快形成共識。

### (二) 婚姻諮詢或諮商時可納入新住民子女之回饋

子女具體表現及回饋對於新住民配偶來說是其個人認同感之指標，不同文化的教育觀也讓新住民配偶不免擔憂自己的觀念及教育方式是否的確更有效果，所以子女表現及口頭回饋，可讓新住民夫妻從中獲得更多自我認同及調整教育策略之意願。

### (三) 研究主題加入新住民夫妻適應歷程中的優勢觀點

後續研究可在適應歷程中強調優勢觀點，探究新住民夫妻如何透過正向策略來解除當下的困境，而這樣的訊息對於欲解決婚姻衝突議題的當事人或實務工作者來說，將更具有研究及參考價值。

## 參考文獻

- 王翊涵 (2011)。「我很辛苦，可是我不可憐！」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在臺生活的優勢觀點分析。臺大社工學刊，**23**，93-136。
- 高旭繁、陸洛 (2006)。夫妻傳統性／現代性的契合與婚姻適應之關聯。

本土心理學研究，**25**，47-100。

夏曉鵬 (2006)。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1-71。

鈕文英 (2017)。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第二版。台北：雙葉書廊。

陳芬苓、黃翠紋、嚴祥鸞 (2011)。家庭暴力防治政策成效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專題計畫。

陳芬苓 (2014)。女性新移民生活狀況的轉變與政策意涵。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7**，29-60。

唐文慧、王宏仁 (2011)。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施展：台越跨國婚姻受暴婦女的動態父權協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123-170。

戴台馨 (2012)。公平對待新住民以沈恩的「能力分析法」來詮釋。輔仁社會研究，**2**，55-79。

Belanger, D., & Linh, T.G. (2011). The impact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n gender and marriage in sending communities of Vietnam. *Current Sociology*, *59*(1), 59-77.

Doss, B. D., Rhoades, G. K., Stanley, S. M., & Markman, H. J. (2009). The effect of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 8-year prospective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6*(3), 601-619.

Feinberg, M. E. (2003).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context of coparenting: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3*, 95-131.

Hycner, R. H. (1985). Some Guidelines for th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Interview Data. *Human Studies*, *8*, 279-303.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



- org/10.1007/BF00142995.
- Lee, H. (2012).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Border Marriag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Korea. *Feminist Economics*, 18(2), 177-200.
-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3), 275-289.
- McKenry, P. C., & Price, S.J. (2005). Families coping with change: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P. C. McKenry & S. J. Price (Eds.), *Families & change: Coping with stressful events and transitions* (3rd ed., pp. 1-2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riedman, S. L. (2012). Adjudicating the Intersection of Marital Immigrati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pousal Murder: China-Taiwan Marriages and Competing Legal Domains.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9(1), 221-255.
- Palriwala, R. & Uberoi, P. (2008). *Marriage, Migration and Gen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andel, T. L. (2011). Is it just cultural? : Exploring (Mis) perceptions of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immigrants through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7(4), 82-93.
- Sheu, Y. H. (2007). Full responsibility with partial citizenship: Immigrant wives in Taiwan.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1(2), 179-196.
- Yeoh, B. S.A., Chee H, L, & Vu, T. K. D. (2013). Commercially arranged marriage and the negotiation of citizenship rights among Vietnamese marriage migrants in multiracial Singapore. *Asian Ethnicity*, 14(2), 139-156.